

# 批判与重构

## ——论为什么要在当代中国语境中重新展开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对话

□ 张双利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 一、当代实践哲学的主题：对现代伦理生活的二次重构

进入 21 世纪,随着资本的全球化,社会正义问题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每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都出现了进一步恶化。2008 年的危机更使得人们清楚地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极端的社会不公正,危机的真正受害者总是社会中的弱者。如此的现实状况对政治哲学提出新的挑战。

要展开对现代伦理生活的再一次思想重构,我们就不能绕开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霍耐特在《自由的权利》《社会主义的理念》中都对这一难题进行了明确回应。他一方面在原则上充分肯定我们必须继承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另一方面又在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具体分析中自觉抛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和对现代国家与市场经济领域之间关系的分析。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霍耐特在《自由的权利》中明确指出,黑格尔和马克思在理解和批判现代世界时,都是从社会自由的原则出发的。黑格尔的自由理论不仅超越了洛克,而且也超越了卢梭和康德,他没有把自由仅仅理解为消极自由和反思自由,而是把它更进一步地把握为社会自由。霍耐特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直接继承了社会自由的原则。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可能无意识地已经受到黑格尔直觉的影响,把社会的合作看作是自由的模式。对于这个特定的社会自由概念的观点,马克思在他的一生中都没有放弃;他始终坚持,个人的反思自由,只有当他通过别人的自我实现而达到他自己的生产性的自我实现的时候,才具有真正的可能性。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方面。霍耐特明确意识到,有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决定着现代伦理生活能否自我

持续:首先,市场经济本身是否具有规范性的性质;其次,人们能否实现从市场经济领域中的个体向现代国家中的公民的过渡。为了能够在理论上说明现代社会生活具有完整的内部结构,他在这两个问题上都直接抛开了马克思的批判。在市场经济的问题上,他简略地提到了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指出马克思一方面对市场经济持有非规范性的理解,把它看作是自私自利的个体之间持续战争的场所,另一方面又对市场经济领域中实际存在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进行了严厉批判。但他马上指出,由于马克思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无力给出替代性的现实方案,现在只能把马克思的批判抛在一边。在市场经济的问题上现在最要紧的是抛开关于市场经济的非规范性的观念,在思想上把握住市场经济的规范性维度,重新复活由斯密、黑格尔和涂尔干所代表的市场道德主义的传统。这样,他就用市场道德主义的传统直接替代掉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传统,自觉地回避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艰难回应。

在现代国家的问题上,霍耐特的回避更为明显,他同时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抛在一边。关于前者,他认为黑格尔直接讲述的是一种具有高度集中性质的国家,其中并没有关于公众参与民主决策的真正机制;关于后者,他认为马克思从阶级统治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国家,根本没有把握住现代法治国家的规范性维度。在此基础上,他试图通过融合涂尔干、杜威和哈贝马斯的相关思想,重新解析现代国家及其与另外两个社会生活领域(个人关系和市场经济领域)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霍耐特关于现代国家的思想基本上是对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思想的继续,他强调公共领域作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中间状态具有重要意义,它为社会公众参与民主决策提供了现实场所。

与此同时,他做出两个重要补充:首先,社会公众之参与民主决策必须有现实前提,即在个人关系和市场经济的领域中社会自由的原则都必须得到具

体实现。只有当具备了这些现实前提之后,才会有社会公众对民主决策的真实参与。其次,在政治文化上,需要参与民主决策的社会公众对其所属共同体有真实的认同。他借助涂尔干关于“宪法爱国主义”的思想,强调我们在当代处境中必须要突破民族主义的文化,建构起超越民族同质性的政治文化。透过这些我们可以明确看到,他在处理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时,借助于公共领域的概念又再次回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 二、当代中国思想的主题:对中国现代经验的思想重构

**(一) 重解市场经济领域的原则。**回顾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思想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它包含着一系列的悖论:虽然我们所致力于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的展开,它首先就带来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边缘化;虽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界被边缘化,但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学界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方面的研究得到了推进和深化;虽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在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这并没有带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退出。相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批判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对立的两极,共同导致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理性规律的承认。其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所采取的理性形式的批判性分析可直接帮助人们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理性运行规律的主张。在马克思那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借助的理性形式的分析受到两方面的重要限定:一是马克思同时强调在该理性形式之下所展开的真实内容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二是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该理性形式下展开的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将导致危机。但是面对着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发展和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引进,这两重限定往往会被人们不自觉地加以遮蔽。去除了这两方面的重要限定之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理性形式的批判反过来强化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理性运行规律的信仰。

面对着如此局面,我们究竟怎样才能概念的高度上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笔者认为,最初的突破口是认真对待在这里实际存在着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重要距离。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理论领域的盛行,另一方面是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远远超出了该理论的解释能力。在这个重要的关口,我们能否给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就成为决定着这场伟大实践能否

进行下去的关键要素之一。这就好像20世纪初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曾经出现过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重大距离一样,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如此时代背景下一再强调能否形成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将决定着整个实践的成败。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形成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根据前文论述可以得出结论,至少我们首先必须依据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经验在理论上直接回应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所有批判。只有这个环节被充分展开,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打破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批判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之间的相互呼应和相互强化关系。在此前提之下,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借助西方思想史上关于市场道德主义的思想资源来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性原则。这也就是说,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思想对话不可避免,只有在充分回应马克思的相关批判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去重新反思黑格尔关于市场经济的伦理性质的提示。

**(二) 重解现代国家与市场经济领域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国家和市场经济领域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我们遇到了更大的挑战。中国的改革进程由国家所主导,由国家所主导的这一进程带来了市场经济领域的相对独立发展。由于市场经济领域被普遍认定为是以个体自由为根本原则,于是很多人认为它在原则上与根源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相矛盾。正因如此,在当代中国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政治哲学一直是热点,政治哲学领域内的争论又一直被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之争所垄断。

简要地说,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首先是直接受到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国家理论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以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理解为前提,中国共产党又在改革过程中带来了社会主义国家与市场经济领域之间的全新关系。我们先来看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国家理论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为了能够更明确地把握住后者的要点,这里借助卢卡奇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理论反思来概述其主要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概念,并指出了无产阶级国家的两个本质性特征:其一是无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质的区别。关于资产阶级国家,他们明确指出它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初步形成成为现实前提,其主要功能在于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充分展开提供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条件。与之相对立,无产阶级国家的首要任务却是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来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其二是无产阶级国家与所有其他阶级统治性质的国家之间的质的区别。所有其他阶级统治性质的国家都是为了维护阶级统

治,无产阶级国家却以消灭阶级统治和消灭国家为目的。

以苏联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为背景,卢卡奇在与卢森堡关于俄国革命的争论中又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国家做了三点重要补充。首先,我们必须从“过渡时期”出发来理解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特功能。卢卡奇再次重申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强调在无产阶级建立政权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最终被确立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决不可能产生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卢卡奇反复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只能导致灾难性的危机,它绝对不能同时带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结局将只是危机和灾难。其次,在这个漫长的“过渡时期”,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相反。也就是说,在这个“过渡时期”,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由政治所主导,国家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是由国家来主导。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颠倒,是因为无产阶级在完成政治革命之后必须以国家的面目来进一步完成社会革命,即对生产关系进行社会化革命。在这一社会革命的过程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在革命中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基础。这样,卢卡奇就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限定在了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最后,在这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政权必须确立起自己的正当性。在韦伯关于社会统治的正当性的思想的直接影响下,卢卡奇明确把理论的重心从无产阶级政权的最终消亡转移到了无产阶级政权在整个过渡时期的正当性之上。卢卡奇指出,能否真正确立无产阶级统治的正当性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国家能否真正完成社会革命的根本任务。卢卡奇还进一步分析了苏维埃政权是怎样通过对国内反革命进行镇压和为争取世界革命而进行非法的和外交的斗争来确立其统治的正当性。

以马克思和卢卡奇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这些论述为背景,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实践。在1949—1978年,有两条核心线索一直贯穿于这一复杂实践过程中。其一是她自觉以社会革命为使命,致力于对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该社会革命的过程一方面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带来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另一方面也在社会成员方面带来了对所有社会成员的阶级成分的明确划分。其二是她同时也在自觉地建构社会主义政权的正当性。从国内政治来看,这一努力被落实为对阶级关系的明确划分和对敌我关系的高度

警惕。阶级斗争被认作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首要任务。这两条线索合在一起,最终所带来的是一个高度政治化了的社会,没有社会之相对于国家的独立发展,更没有这两个领域之间的明确分离。

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明确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市场经济领域之间的相对分离。要理解这一新的变化,关键要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或“过渡时期”)的本质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根据这一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在于最终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公有,同时也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其当前的首要任务更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又由于市场经济被认作是发展生产力的最为有效机制之一,它在社会主义阶段将得到充分承认和大力发展。随着市场经济机制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不仅有了国家与市场经济领域之间的相对分离,同时还使每个公民作为独立个体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确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带来了对社会的“非政治化”。其次,当前的社会改革和之前的社会革命一样,都明确地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导之下展开的。也就是说,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家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主体,它带来了相对独立的市场经济领域的发展,制造出了国家与市场经济领域之间的相对分离,它同时还致力于把两者之间的关系纳入国家的统摄之下。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大致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理论和实践背景之下,在当代中国会出现一种黑格尔式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在这一关系存在着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缺陷。以黑格尔法哲学为参照,我们可以说在这一关系存在着两个必然性的过渡:一是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黑格尔那里这一过渡被从概念上把握为从本质到现象的过渡。但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由社会主义国家主导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虽然被认定为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和具体机制却还没有概念性的把握。二是市民社会进一步向国家的过渡。在黑格尔那里,这一必然过渡一方面在概念上被把握为是从必然性向自由的过渡,另一方面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又被落实为从市民向公民的提升。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由于我们尚未能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建立起支撑其伦理性质的具体机制,也就很难在概念上说明国家之相对于市场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何以能够被公民们普遍认同。怎样在思想上回应关于这两个过渡的难题就成为我们在当代中国语境中重新展开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思想对话的又一重要主题。

■ 《现代哲学》2017年第5期,约15000字